

李南央等著

我有这样一个

母亲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南央等著

我有这样一个

母亲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李南央等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4

ISBN 7-5321-2363-4

I. 我… II. 李… III. 李锐 -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570 号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王伟

彩图设计:王志伟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6 字数 240,000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册

ISBN 7-5321-2363-4/I·1888 定价: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063782

序言

李南央

1978年，在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见到了分别十多年的父亲。父亲问我那些年的境遇，我向他讲述了在家里和社会上的遭遇。父亲默默地听完，很难过。临走时，父亲说：“你那些经历应该写下来，是一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并说会帮助我提高写作水平，要我以后再写信，附上自选题材的作文。我照着做了。父亲真的逐字逐句地修改，说我的文字还可以，只要坚持，会有写好的一天。可我自己并没有信心，觉得不管怎么努力，写出的东西总是像中学生作文，实在不会有人爱看。后来父亲平反复出，没有工夫再看我的文章，我也就乐得不再费劲儿了。

“四人帮”倒台后，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好多知道我们家的事儿的朋友开始劝我把那些事情写出来，说都是极好的文学题材，读者会很多。再后来我出了国，交了一些外国好朋友。他们也说我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他们要当第一读者。我这才相信自己的故事可能确实是值得写的，才认真地对自己说：“要写。”可是认识到应该写和到真正开始写，这之间是天壤相隔的。疏懒和怕写不好，使我一拖又是几年。

那些年间每次回国,父亲总要旧话重提,说你光干那个机械工程师有多大意思,人是应该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东西的。你有这个条件,你的那些经历写出来,是可以流传下去的。我总是“嗯、嗯”地答应,感到父亲对我只说不“练”的失望,颇感愧疚。感谢王朔的作品,开创了讲老百姓大白话的文风,使我知道该怎么讲自己的那些故事了:不要想写成什么文学作品,就平平常常地说,朴朴实实地讲,要是写的时候先把自己打动了,就一定是好文章。有了这点儿底气,我终于在再不写出点什么,实在对老父无法交待的压力下,试着写了第一篇文章,是关于父亲的,很短,请人推荐给香港的《开放》杂志。他们竟然采用了,登在1993年9月号上。这就是收入此书的《长长短短谈父亲》的原型。文章被当时中国大陆杂志《读书》的总编看到了,他拿去给我父亲,说:“你的女儿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我想在《读书》上转载。”父亲看了文章,一口否定了。认为我有的话太“出格儿”,会给他惹麻烦。但是他还是把编辑的话转给了我,意在鼓励我,总算有了个不太差的开头。我的第二篇文章被《开放》选作了那期的首篇,就是本书中的《平等争论》。这使我大受鼓舞,觉得可以开始写那个最重要的题目了。

亲父《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是1997年写成的,还是寄给了《开放》。承蒙湖南《书屋》杂志当时的主编周实先生的厚爱,把文章引入大陆,使得国内很多杂志、报刊竞相转载,有人形容说“铺天盖地”。我在美国却一无所知。直到有朋友告诉我去看一个网址,才知道人们是在多么热火朝天地争论,才知道有人还在激动地“骂娘”。一时有话要说,就有了本书中的《答读者问》。不过总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要说的话太多,可说不清楚。直到于光远先生送给我一本1999年5月的《南腔北调》,一下豁然:要讲道理,做理论分析,得有曹河先生那样的文学修养和历史底蕴。非

如此,不能写出《李锐的女儿说母亲》。曹先生力透纸背的立论,使我感到自己学识的捉襟见肘,不能再试图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文章了。想到如果把自己写的东西同别人对产生我的母亲这般人物的那段历史,那种土壤,那类文化的挖掘和评判的好文章合在一起出本书,该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

这以后,只要在父亲那里碰到大文章家称赞我的那篇文章,我就不客气地要求:“请您写篇评论怎么样?”感谢王若水先生,朱正先生,少志先生,单少杰先生,李普伯伯对我想法的支持和欣然允诺,写出了那么好的文章。感谢周实先生邀到了父亲湖南的老同事李冰封和钟叔河先生,感谢两位先生从特殊角度的“加盟”。我特别要感谢母亲青年时代的朋友荫柏伯伯给我写的信,他是母亲的旧友,因而他的文章有着不同的意义。

对于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西方人是用一个个具体人的,具体家庭的故事去揭露其惨绝人寰,去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大屠杀”几乎和爱情故事一样,成了好莱坞永恒的主题。国内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开辟了一块老百姓讲述历史的天地(收入本书的《我家的老阿姨》就是在《老照片》编辑张杰先生启发和邀请下写的)。中国这片土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无能幸免于那一次次的,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运动”。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故事都是特殊的。这些故事被讲述得越多,那段历史显现的就越完整,越真实,越永远不会被忘记。只有记住自己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罪行的民族,只有认识了罪行根源的民族,才会成长。这个民族的后人才会改变他们前辈所曾有过的丑陋,变得优秀和美好。我讲了我知道的故事,我说了我想说的话。有人看了,就会有人记住。看的人多了,其中自然就会有人思考。有了思考,就会有进步。那我除了机械工程以外,还给这个世界多留下了一点东西,可以面对父亲了。

2002 年 月 1 日 11 日

补记：

这篇序方才住笔，接悌忠打来电话，告之刚从网上看到王若水先生去世了。泪水一下涌入眼帘。去年 10 月 3 日从大陆回美国的头一天，和父亲一起去协和医院探望病中的若水先生。他问我：“你那本书什么时候能出来啊？要抓紧，不要失去时机。”

我痛恨自己的懒惰，未能在他生前将此书出版。他的文章《倾心理病》是留给我和读者的永远的纪念。

目录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1)
长长短短谈父亲	李南央(37)
平等争论	李南央(58)
推荐《李锐其人》一书	李南央(66)
活法儿的自由	李南央(72)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	李南央(80)
青春的音乐	
——女儿与她的钢琴老师们	李南央(100)
我家的老阿姨	李南央(116)
答读者问	李南央(135)
难以忘却的两天	巴悌忠(150)
一组信札	
寄李南央	吴 淞(160)
我陪你落泪	银 英(163)
“送”烂橘子朋友的信	丹 丹(164)
愿青春的乐曲奏得更美	大 年(170)
两个相反的典型	
——谈李锐并范元甄	李 普(175)
中国亲情文化个案研究	
——解读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单少杰(204)
老社长	

- 李锐识小 钟叔河(234)
- 左倾心理病
- 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王若水(243)
- 思想异化的悲剧 少 志(257)
- 是家务事,是大历史 朱 正(259)
- 并非家务事
-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及《答读者问》读后 李冰封(266)
- 李锐的女儿说母亲
- 也是“铁屋中的呐喊” 曹 河(277)
- 情义恩怨
- 从李南央“骂”娘谈起 奕 豹(279)
- 一个特殊的母亲
-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读后 网上人(283)
- 附录:
- 作者自传 同 (286)
- 《湘滨往事》(摘录) 李力康(288)
- 周恩来同志的教诲 徐 炜(316)
- 革命队伍中女性的不幸
- 为范元甄辩 崔卫平(321)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好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国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拍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像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像是范元甄。”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像。”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父亲这样说。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复复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两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曾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扮演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

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像毁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两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

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

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被派往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北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哪家单位。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1956年还是19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19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所办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

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分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一下子垮下来。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从亢进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甲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分配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从记事起，我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全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永远是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像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像爸爸的脸一

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像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已久。父亲是独子，十七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承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年5月竟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将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

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像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抱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些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

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刘澜波为当时的水电部部长,我爸是副部长)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认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住,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刁又狠,及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我爸原来的名字)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1980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五十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爸爸当年在水电系统有一句著名的“反党”言论:“老干部要认真学习知识、文化,否则就不要老狗挡道。”妈妈却是“左”的,极为反感这些老知识分子。跟我

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在“文革”中常对我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他的秘书还曾试图救助他，不识时务地替他辩解，说李锐在知识分子中还是非常有威信的，有些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不应该算是反党。幸亏这位秘书是那时机关中少有的三代血统工人出身，才免遭同时被整肃的命运。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得太大了，妈妈操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我小时候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像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1991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电视机以松下25吋，平面直角，遥控，多制式为好。视你经济力量而定。母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九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轱辘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三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三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三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像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丫头越长越像李锐。”可总有些不识相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困得东倒西歪，听着她在里屋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哪。

最可怕的是我妈的午觉，要是在那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不弄出一丝声响。可是楼上邻居的动静是免不了的。